

吴运生 著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

岳麓书社

吴运生 著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夏剑钦
封面设计 许康铭

F 092.2 / 6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

吴运生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0,000 印张:8.5 印数:1-2,000

ISBN7-80520-491-8
G·54 定价:6.5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序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从先秦到明清之际,在经济、文化、科技等许多方面,都还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五千年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多彩的经济思想,在世界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由于古籍繁纷,加之过去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得多,对优秀文化成果继承发扬工作做得少,以至许多人,乃至经济理论工作者,对我们祖先的经济思想却知之甚少。有些经济思想本是中国传到外国的,却误认为是外国传进来的;有些问题研究本是我国领先的,但错以为外国是领先的;有些观点前人早有论述,但总以为是今人的创见,……真是愧对前人,但又非傲视古人,而是由于对古人的研究成果学习、研究、传播不够的缘故。

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当然并非空白,有些才华横溢的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毅力,在祖国古代文化园地中辛勤耕耘,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但总的来说,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仍然属于有待开拓中的年轻学科。吴运生同志撰写的这部著作,对于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弥补学术界研究的不足,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古人思想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对于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研究》这本专著，系作者吴运生同志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从重农、土地、商品、货币、市场、财政、分配与消费等方面，精辟地论述了我国古代思想家的经济思想。

我觉得本书至少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采取专题研究的方式。经济思想史一般属编年史的范畴，大都按历史顺序分期进行评说，而本书却按专题进行论述。虽然两者都是史论结合，但结合的方式不同，给人的启迪也有所不同。本书就当前的重大经济问题，古人曾经有过什么论证，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第二，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例如，过去对古代重农思想的研究偏重于重农抑商方面，而本书却着重研究古人关于农商结合、重农立国、科技兴农等方面的思想；过去对古代货币思想的研究偏重于货币职能、金属货币与纸币的优缺点，以及金属货币的铸造与管理等方面，而本书却着重从货币的产生与发展、货币的本质、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关系、货币流通规律等方面对古人的思想进行分析与论证。同时，本书作者以顽强的毅力，在浩繁的古籍中，广搜博览，发掘出学术界以往研究甚少的市场思想，把古人进行市场调查与预测，重视市场信息，采取官营与民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实行薄利多销、名人效应和消费示范等灵活多样的经营策略，以及开源节流、量入为出与量出制入、黜奢崇俭与适度消费等经济思想翔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总之，这本书所论述的虽然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但读起来并不感到离现实很远，由于立意新颖，思路开阔，取材丰富，古为今用，觉得非常贴近现实。它是一本颇有特色的理论专著，适合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大专院校经济、历史专业师生和从事这方面

研究的人员阅读,也可作为经济管理部门的党政干部和实际工作者的参考读物。

当然,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 中来研究其经济思想,并非一日之功,其资料还有待不断发掘和整理,其认识也有待不断深化,甚著作也有待进一步完善。不过,我相信本书的问世,对于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定能起到铺路石的作用。希望在此基础上,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者在弘扬民族文化中奉献出更多的佳作,让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出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吧!

廖 九 如

一九九五年二月五日

目 录

序	廖九如
第一章 关于重农的思想	(1)
第一节 论农为立国之本	(1)
第二节 论重本与抑末	(9)
第三节 论农业科学技术	(17)
第四节 中国古代重农思想评价	(27)
第二章 关于土地的思想	(39)
第一节 论土地国有制	(39)
第二节 论土地私有制	(48)
第三节 论土地兼并	(53)
第四节 中国古代土地思想评价	(65)
第三章 关于商品的思想	(75)
第一节 论社会分工	(75)
第二节 论商品生产与商品价值	(84)
第三节 论商业的职能与商人	(95)
第四节 中国古代商品思想评价	(103)
第四章 关于货币的思想	(113)
第一节 论货币的产生与发展	(113)
第二节 论金属货币和纸币	(123)
第三节 论货币的职能作用	(134)

第四节	中国古代货币思想评价·····	(145)
第五章	关于市场的思想·····	(157)
第一节	论市场概况与作用·····	(157)
第二节	论市场调节手段·····	(167)
第三节	中国古代市场思想评价·····	(179)
第六章	关于财政的思想·····	(192)
第一节	论赋役政策思想·····	(192)
第二节	论其他财政思想·····	(205)
第三节	中国古代财政思想评价·····	(217)
第七章	关于分配与消费的思想·····	(229)
第一节	论社会财富的分配·····	(229)
第二节	论黜奢崇俭与适度消费·····	(243)
第三节	中国古代分配与消费思想评价·····	(253)
后 记	·····	(265)

第一章 关于重农的思想

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萌芽于西周以前的经济传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家的经济思想,特别是荀况的经济思想中,发展于春秋战国之后漫长的经济实践中。重农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思想。它的主要特点是:阐述了农为立国和治国之本,认为“众民、强兵、广地、国富必生于粟”;阐述了重农必须抑末,抑末才能重农,只有采取重农抑末的对策措施,才能促进农业的发展;阐述了农业科学技术,已经有了科技兴农的初步见解,提出了务天时和务地利学说。同时,许多思想家重视多种经营和农商结合,提出了一系列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管理的政策措施。至今,许多见解仍有科学价值,为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第一节 论农为立国之本

古代重农学者把农业生产放在生活和施政的首位,从养民、富民、富国等方面来阐明农为立国和治国之本。

一、农为养民富民之本

西汉初年的重农学者郾食提出“民以食为天”^①，至今已被人们奉为至理名言。这句话反映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在于养民。春秋时期的儒家先圣孔丘从养民的角度。大谈其“重农”、“足食”和“谋食”。另一名思想家管仲更明确地指出：“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② 西汉贾谊也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③，所以，应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否则，就会产生如下问题：“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④ 古人从粮食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衣食足才能知礼节等方面来阐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十分强调发展农业生产。

农不仅可以养民，而且还可富民。富民论是我国古代思想家颇为流行的经济思想。在富民论中，他们从生产、流通、分配等方面来探讨富民的途径，其中探讨最多的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业生产。战国时期的东国法家提出强本富民的思想。他们指出：“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⑤ 又说：“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⑥ 东国法家在这里所说的强本事，从广义来理解，是发展社会生产，从狭义来理解，

① 《史记·郾生、陆贾列传》。

② 《管子·牧民篇》。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汉书·食货志》。

⑤ 《管子·五辅篇》。

⑥ 《管子·牧民篇》。

则是发展农业生产。从他们著作中所阐述的许多内容来看，他们关于农业的概念比先人进步。从原始社会的经济传说，到奴隶社会的经济思想，对农业的理解，往往局限于粮食和谷物的生产。而东国法家已突破这一思想界限，他们认为，谷物的生产非常重要，“民非谷不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①，但农业并不限于只生产谷物，还需要“桑麻殖于野”，“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②。这就是说，他们提出的强本，主要是指发展以粮食为重点的农、林、牧、副、渔的生产，这种具有现代大农业的思想，无疑是对传统重农思想的重大突破。

战国时期的儒家亚圣荀况，是先秦最有代表性的重农学派。他提出强本节用而富民的思想。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③ 他在这里首先强调强本，即加强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为他认为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尽力强本，保证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国家稳定的财政收入，是富民的根本途径。他也强调整节用，即节约个人的消费开支和国家的一切行政开支。在他看来，强本还需节用，节用能促强本。他说：“节用裕民，……裕民则民富，民富则

① 《管子·牧民篇》。

② 《管子·立政篇》。

③ 《荀子·天论篇》。

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① 在这里，他是围绕着强本来思考问题的，强本为主，以节用促强本。这与战国初期的墨家学派墨翟的固本节用有所不同。墨翟的固本节用，所强调的是节用，把节用看成富民的主要途径。而荀况在辩证地看待强本与节用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而着重把强本看成富民之本。

二、农为富国强国之本

农不仅可以养民富民，而且可以富国。富民与富国是不能截然分离的，两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矛盾统一体。荀况认为，如果统治集团不顾发展农业生产，“伐其本，竭其源”，“好取侵夺”来“富筐篚、实府库”^② 的话，那么“富国库”与“富民”就是矛盾的。这种矛盾表现在，“田野荒而仓廩实，百姓虚而府库满”^③，即民贫国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带来国库空虚和政治危机，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④ 荀况否定了这条与富民相矛盾的“富国库”之路，指出发展农业生产是“富国”之本。如果农业生产发展了，老百姓富裕了，整个国家的财富也会增加，“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⑤，下富是上富的基础和必由之路，因此，二者是可以统一的。

荀况关于富国与富民相互关系方面的论述，比先人进步。在荀况之前，秦晋法家极力强调富国而不太重视富民问题；先秦

① 《荀子·富国篇》。

② 《荀子·王制篇》。

③ 《荀子·王制篇》。

④ 《荀子·王制篇》。

⑤ 《荀子·富国篇》。

儒家学派孟轲突出地宣扬富民，激烈地反对秦晋法家的富国主张。他把富国与富民看成是互相排斥的，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东国法家则只强调富国与富民的一致性，他们说：“足民有产，则国家丰矣”^①，“民不务经产，则仓廩空虚，财用不足”^②，“富上而足下，此圣之至事也”^③。这就是说，他们把二者看成是完全统一的，而看不到其封建国家与民相对立的一面。荀况既继承了前人的思想成果，又有所发挥和发展，提出了富国与富民是对立统一的新见解，并强调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达到“上下俱富”的目的，这是非常可贵的。

农不仅可以富国，而且可以强国。早在西周后期，王室大臣虢文公为了规劝周宣王行籍田之礼，从六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农业的重要性。他说：“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郭庞纯固于是乎成”^④。这就是说，农业是人民之大事，因为祭神所需的祭品出于农业；人民繁殖基于农业；事物的供应来自农业；社会的和协赖于农业；财货的增殖始于农业；国家的强固成于农业。

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思想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农业是强国之本，对西周虢文公的思想有所发挥和发展。他们大都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农业能解决民食和农

① 《管子·君臣上》。

② 《管子·重令》。

③ 《管子·小问》。

④ 参见《国语·周语上》。

副产品的供应问题,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墨子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① 古人把是否“足食”作为衡量经济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志,如果“足食”,经济政策是成功的,国家就会强固。反之就是“饥国”,作为统治阶级的“寄生之君”就可能地位不稳固,甚至被推翻,“国非其国也”;二是农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窳仓廩者财之末也”^②。如果农业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才会增加,才能“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③,国库才有了可靠的财富来源,国家才会强固;三是农业的发展能以物质文明带来“知礼节”和“知荣辱”的精神文明,协调社会的发展,国家才会强固。如果农业不发展,老百姓生活穷困,“由是风俗日偷,礼义绝灭,小民攘利而不避刑,士大夫殉财而不知耻”^④,社会就不会安定,国家就不会强固;四是农业的发展能众人口,使国家繁荣与昌盛。在农业生产水平十分低下的古代社会里,战胜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需要人口“庶”。因此,古代许多思想家都把“庶”与“富”作为施政的目标。孔丘周游列国时,既赞叹卫国人口的众多是“庶矣哉”!又回答人口多的施政目标是“富之”。富是“庶”的基础,也是“庶”的结果。强本富之,才能使人口“庶”之,而“庶”则往往是古代社会强国的象征。“庶”才是民富国强之本;五是

① 《墨子·七患》。

② 《荀子·富国篇》。

③ 《荀子·富国篇》。

④ 《唐甄·存言篇》。

农业的发展能养民和富民,才能“富安天下”,稳定社会,强固国家。西汉贾谊总结了秦灭亡的历史教训后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①又说:“天下富足,资财有余,人及十年之食”^②,才能“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③。北宋范仲淹在他提出的革新时政的建议中,阐述了重农才能富民,富民才能社会稳定的思想。他说:“厚农桑。臣观《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寇盗自息,祸乱不兴”^④这就深刻阐述了“圣人祸乱不兴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⑤的思想,只有发展农业,才是养民之政,富国强国之本。

三、从立国治国高度重视发展农业

自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提出农为养民、富民、富国、强国之本后,为后世的许多重农思想家所接受,并予以发挥和发展。唐代思想家陆贽提出立国养民必须重农足食的思想,他说:“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养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养矣;足食而不先备灾,食固不足矣。为官而备者,人必不贍;为人而备者,官必不穷。是故论德昏明,在乎所务本末,务本则其末自遂,务末则其本兼亡。”^⑥

① 《新书·无蓄》。

② 《贾谊集·论积粟疏》。

③ 《贾谊集·论积粟疏》。

④ 《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

⑤ 《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

⑥ 《陆宣公集·均节赋税恤百姓奏疏的第五条》。

唐代白居易在他的经济著述中,十分强调农桑是立国养民之根本。他说:“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馁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则人之性命系焉,国之贫富属焉。”^① 他在这里把发展农业看成是关系到人们生存和国家贫富的大事情,因而是立国养民之根本。

历代思想家根据当时立国养民的现实来阐述其重农重谷思想,也为许多帝王所接受。秦孝公运用商鞅变法,推行农战政策,从服务于战争与立国的高度来认识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既重农又重战,农战是为了立国之需要。他们说:“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②

西汉时期的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正月(即公元前178年正月)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③ 同年九月,汉文帝又诏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④ 十二年三月(即公元前168年3月)又下诏强调务本,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⑤ 十三年六月(即公元前167年6月)又下诏强调农为天下之本,“其除田之租税”^⑥。这足以证明汉文帝把农业看成是立国治国之本,并采取减免或全部免除租税

① 《白氏长庆集·论和杂状》。

② 《商君书·农战》。

③ 《汉书·文帝纪》。

④ 《汉书·文帝纪》。

⑤ 《汉书·文帝纪》。

⑥ 《汉书·文帝纪》。

等政策措施来鼓励发展农业生产。汉景帝继续推行“贵粟”政策,从立国治国的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因而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

第二节 论重本与抑末

重本抑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先秦战国时期,一般是指重农抑工商之意。西汉之后,一般是指重农抑商之意。现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重本抑末思想概述如下:

一、先秦时期的重本抑末思想

重本与抑末,并不是必然相联系的同一概念。早期的重农思想,并没有和抑工商的言论相联系。春秋时期的孔丘,已有重农重食思想,但并无抑工商之言论。一方面,他把民食和丧、祭并列为最重要的几项大事,并且把民食放在首位,即“子之所重:民食、丧、祭。”^① 他从重食、足食方面关心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已具有简略、朴素的重农思想;另一方面,他并无抑商之意,他的学生端木赐是卫国的大商人,往来于诸侯各国之间经商,端木赐的行为已不完全合乎孔丘的礼制,但孔丘并没有责怪端木赐,还把端木赐和他最信任的学生颜回相提并论。可见,他并不反对儒者经商;再一方面,孔丘看到当时社会上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并在日益向前发展,孔丘对此并不反对。在《论语》中也找不到孔丘抑工商方面的言论。

最早将农业称为“本”,并提出“固本”主张的墨翟,在他的著作中也找不到抑工商方面的言论。不仅没有抑工商言论,而且

^① 《论语·尧曰》。